

城市品评

——以西安为例看异化的城市记忆

祁嘉华 梁爽◎著

241.1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城市品评

——以西安为例看异化的城市记忆

祁嘉华 梁爽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品评——以西安为例看异化的城市记忆 / 祁嘉华,
梁爽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112-14241-5

I. ①城… II. ①祁… ②梁… III. ①文化名城—保
护—研究—西安市 IV. ①TU984.2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6777号

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 受到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历史悠久的城市。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 这些城市很多不是在延续历史文脉, 而是同样走着时尚的路子, 陷入了形式主义、忽视生态、没有特色的怪圈。中国的历史城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全书内容包括再建唐城的选择、唐代建筑走笔、唐代的文化属性、雁塔广场工程、芙蓉园遗址工程、曲江遗址工程、唐西市工程、大明宫遗址工程等。

本书可供广大建筑师、城市规划师、风景园林师、城市管理人员以及高等院校建筑学、城市规划学、风景园林学等师生员工学习参考。

* * *

责任编辑: 吴宇江

责任设计: 董建平

责任校对: 陈晶晶 赵颖

城市品评——以西安为例看异化的城市记忆

祁嘉华 梁爽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京点设计公司制版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16 字数: 406千字

2012年8月第一版 2012年8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88.00元

ISBN 978-7-112-14241-5

(2231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前言

对建筑界来说，新千年是伴随着一场场“地震”开始的。先是围绕奥运场馆建设展开的激烈争论，再是由国家大剧院的选址是否合适引发的联名上书，直到今天，关于央视大楼的造型问题还在民间存在着各种说法，褒贬不一。应该说，这是建筑界整个行业走向社会，接受社会检验的结果，也是社会关注建筑界，试图从民意的角度影响建筑领域的表现。比较行业封闭的时代，这是社会进步到一定程度上的必然结果，有助于建筑界从房屋建设者向文化建设者的转型。

《城市品评——以西安为例看异化的城市记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上酝酿而成的。

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历史悠久的城市。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这些城市很多不是在延续历史文脉，而是同样走着时尚的路子，陷入了形式主义、忽视生态、没有特色的怪圈。这是建筑学者的洞察。中国的历史城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是文物官员的总结。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这是民俗学家的惊呼。这些声音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鲜明的所指。为了保护历史名城，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展了全国性的“历史文化名城”评选活动，到2011年，入选的城市已达117座之多，数量喜人。但是，到目前为止，有资格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只有远离大城市的丽江和平遥。由于年代久远，历史上处于华夏文化中心位置的城市集体空缺尚有情可原，作为农业文明巅峰时期的汉唐都城同样榜上无名，甚至于年代不算太久远，像北京那样一直属于传统文化重镇的城市仍然达不到标准就不能不发人深省了。最新统计的结果显示，我国目前查明的不可移动文物有70余万处，但是国土面积只有我国1/17的法国，20世纪70年代的国家统计数字就已达到了200万之多。更严重的是，在全世界都在千方百计保护历史城市，并且总结了大量行之有效经验，尤其是反面教训的今天，欧美一些国家历史性城市受保护的范围已经能够达到80%以上，而我们的历史性城市却经受着旧城改造和旅游开发的双重夹击，传统不再，古风渐失。

以空间形态存在的文化遗存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异化”。然而，要想对这种现象进行认定和评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首先是人们对古迹遗址的价值认定已今非昔比。尽管当年大拆古城墙那样的事件已经不太会发生，但是，人们也不太可能以梁思成那样的精神来对待古迹遗址，没有“拆掉了一座城，就像挖去我一块肉”的感觉了——不是因为麻木，而是因为观念日渐多元、利益追逐成共识的今天，人们对古迹遗址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前的古迹遗址是祖先的象征，加上“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命名，自然会有几分神圣。现在

的古建遗址是一种资源，加之国家并没有对遗址周边环境方面保护的明文规定，更没有针对古建筑遗址工程文化质量方面的验收标准，百姓大多也没有从整体上观赏鉴赏古建筑遗址的觉悟。于是，以遗址保护名义的征地、引资、再建方面的优惠政策，一次投资长期收益的诱惑自然会唤起人们的种种冲动，从一个个“没有”中寻找着商机。于是，从“祖先的象征”到“待开发的资源”，“神圣”仿佛只有转化成为“利益”的时候才具有意义。

其次是管理体制上的滞后。按照现行的管理方式，古建筑遗址属于文物，古建筑遗址的周边环境显然不是文物。文物由文物部门管理，自有一套保护的标准；环境由城建部门管理，也有一套发展的措施。前者的目的是千方百计地留住旧的，后者的目的是紧跟时代不断创新。于是，只要古建筑遗址本身还在，文物部门就无话可说，周边的土地则可以按照市场需要来安排，由城建部门根据城市发展需要去设计开发。经过这样的运作，比文物所在地大几十倍乃至上百倍的大面积开发，不仅使文物周边的环境发生了质变，原本处于“主角”地位的文物也相形见绌，反倒成了现代城市中的一种点缀性摆设。文物部门确实能从中看出“卸磨杀驴”的味道，但是仍然无话可说，因为文物确实还在；城建部门由此得到了业绩，因为城市的现代化面貌确实有所提升，况且在土地的一买一卖中还给当地带来可观的收益；当然，那些能够找到这种几乎零风险项目的开发商们也无不欢欣鼓舞。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只有一些文化学者最为不安，因为，他们对古建筑遗址有着另一番价值认定，能够看出被置换成资本以后的古建筑遗址，实际上已经从无价变成了有价。然而，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中，文化学者游离于文物、城建和开发商之外，充其量只能在一些座谈会上作为外请专家出现一下，说说一家之言罢了。古建筑遗址如何开发，周边环境如何规划，是经济标准还是文化标准等等实践性的问题，各有各的归口，各有各的做法，文化学者反倒成了“外行”被束之高阁了。

再次是研究水平的滞后。平心而论，文化学者被束之高阁是有其必然性的。他们的意见一般都比较宏观，带有明显的理论色彩，而文物保护、城市建设、文化创意等等环节要做成一件事，需要的是具体措施和方案。一个理论，一个实践，两者之间存在的不合拍是显而易见的，专业上的隔膜确实需要双方的磨合，不好论出长短。在学科壁垒森严的年代，理论和实践各行其道是必然的。在多学科交叉已成大势的今天，从事理论研究的文化学者向实践靠拢，了解文物保护、城市建设、文化创意等方面的基本规律和做法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为从事文物保护、城市建设、文化创意等等领域提出具体可行的意见来。其实，要达到这样的状态，对文化学者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要将已有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还要培养关注科技前沿，了解传统技艺，通晓建筑设计等专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只有这样，文化学者才可能克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提出的意见才会更加具有针对性，为古建筑遗址高规格保护作出贡献。

应当说，《城市品评——以西安为例看异化的城市记忆》不仅对这种状况提出了质疑，还试图为这种状况的改变建言献策。本书以在唐遗址上建设的五大工程为对象，在现场勘查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学、建筑学、规划学、设计学、生态学、美学、文艺学和符号学等多学科知识，结合国际社会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通行做法，对浩大的遗址工程群进行了多角度分析，从理论到实际，从学理到技术，既体现了多学科研究的理论水准，

也有从具体工程中发现各种问题的鲜活案例，使遗址上各种建筑工程的文化异化现象得到了揭示，并在下列问题上有所建树。

还原历史。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尤其是那些举足轻重的历史，往往能成为一个民族的骄傲，具有不容曲解的神圣性。尽管有人提出过“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的戏说，只不过具有反讽的意义。使历史的真实性得到保存，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学者们的基本共识。在我们看来，古建遗址是以空间形式存在的历史，所承载的信息同样具有一定的严肃性——不管是古建遗址本身，还是在遗址上建设的各种工程。为了让公众对唐代建筑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了解，我们在阅读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唐时长安城内的宫殿、庙宇、园林和市场的建设进行了引证分析，将慈恩寺、芙蓉园、曲江遗址、西市和大明宫放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上来认定，分析出其中所承载的儒释道等文化精神，基本上还原了这些古迹遗址的历史风貌。尤其重要的是，为了找到唐代进行各种创造活动的美学依据，我们还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最能反映社会心理的艺术创作情况，将“诗意”确定为唐代社会的审美风尚。这些，对公众准确地认识唐代历史，把握唐人从事建造活动的基本特点提供了参照；对公众通过建筑所达到的实际水平来理解唐代所以有中国古代社会巅峰之美誉提供着依据；对目前将唐代建筑简单地认定为“以大为美”、“奢华为尚”的种种误读，也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还原工艺。当下建筑的质量肯定要比唐代的好，这几乎是毫无争议的结论。不过，业内的人士都知道，从长安城内主要建筑最后被拆除异地再用的史实看，这些建筑的基本寿命至少都在百年以上；而当下的建筑寿命，城市的是30年，农村的只有15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材料和工艺上的差异——传统建筑的材料和工艺是可以循环使用的，具有可持续性；当下的建筑材料和工艺多为一次性的，寿命自然很短。这是中国传统建筑智慧的集中表现，也是传统建筑文化博大精深的集中表现，理应继承并发扬光大。在古建遗址维修和周边新建的空间中体现这些智慧，不仅有益于延长古建遗址的寿命，也是对传统建筑智慧的一种弘扬。然而，五大遗址上修建的广场和公园并没有这么做。这里有工期的问题，有成本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参加这些工程设计和施工的人员，到底对传统建筑工艺持什么态度，有多少了解？为了让公众对唐代使用的建筑工艺有一个大概了解，我们在查阅古籍和实地勘察的基础上，对唐时可能使用的建筑工艺和材料进行了研究，将慈恩寺、芙蓉园、曲江遗址、西市和大明宫等地的建筑情况作了大致的追溯，不仅从出土的三彩琉璃瓦、彩色石栏和富于色彩的建筑名称上，勾勒出了当时皇家建筑的绚烂多姿；还从遗址上发现的窑厂以及使用废弃建筑材料铺设地基的做法上，发现了唐人就地取材、废物利用的可循环意识；更重要的是，从长安城市的规划布局、使用色彩、天际线设计以及道路分布等等方面，证明了当年的城市建设者对祖先建筑智慧的谙熟和遵从，从而使这座帝都无处不体现着中国建筑特有的文化气息。这些，不仅有助于公众准确地认识唐代建筑的实际情况，领会其中所达到的高超工艺，也有助于引导公众对中国传统建筑智慧的了解，提升人们对传统建筑实际水平的认识。当然，这些内容也在提示人们，面对历史性建筑，不能仅仅着眼于投资多少，由谁设计，漂亮与否等形式，还应当发现和甄别其中的文化信息，注意内在质量。

还原文化。古建遗址的价值主要不在创造物质利益而在于精神传承。本着这一原

则，国际社会在20世纪70年代便制定了公约，将历史性、艺术性和科学性作为古建遗址的基本属性，明确古建遗址的所在国家拥有“保护、保存、展出和传给后代”的责任。2002年我国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也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强调的仍然是古建遗址的精神属性。但是，这些公约和法规在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人们眼里，仍然可以作出不同的解读。在那些欠发达地区，最有市场的解读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既保留文化的斯文，又不掩饰贪婪，将文化进行商业化处理。西安的五大遗址工程显然就是按照这种思路展开的。从现在的情况看，“保护”是局部而小范围的，开发是全方位大面积的；“保存”主要是用钢构架和加厚玻璃完成的，是典型的现代意义的封存；当遗址变成公园或广场以后，“展示”也被游览和叫卖取代；经过这样的改造，古建遗址的经济味道浓了，现代味道重了，“传给后代”的也不再是真实的原版了。能够将这种开发为主，利益第一的做法揭示出来，仅有勇气是不够的，还需要拥有扎实的历史知识和对传统建筑工艺的熟悉，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有前承历史、后对子孙的责任意识和境界。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是有质量标准的，对古建遗址而言，因为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才在一代又一代的保护中走到了今天。在现代文明中，任何利用这些价值致富发家的做法，不仅仅是目光短浅，更是一种自我否定。因为，改变古迹遗址的性质和面貌，也是在改变历史的性质和面貌，同样会给后人留下虚假的东西。不仅会让国际社会诧异，也会引来子孙后代的不解。

“异化”曾经被经济学家用来形容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将人变成了“非人”，也曾经被美学家用来形容后工业时代美向“非美”的转化。这样看来，“异化”是个动词，带有由正向负转化的意味。其实，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美与丑、善与恶都不会截然有别，一成不变，而是一种相反相成、相互转换的存在。这里就有一个“度”的问题。超过了“度”，美的可以蜕变成丑，善的也可以演化成恶。于是，越是在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事物，人们在实施过程中就越会注意其中的分寸，不敢越雷池一步。像人类祖先面对图腾，基督徒面对十字架，大和民族面对天皇等等都与这种情况相类似。美学将这种可以引发人们敬畏感的审美对象称之为“崇高”，社会学则将能在人们心中引起崇高感的东西称之为“神圣”。今天的国人确实已经跨越了图腾崇拜的年代，不少人对基督等宗教信仰也不屑一顾，更敢于对神仙皇帝表现蔑视。同时，也确实从这种跨越中感到了进步，从这种不屑一顾中感到了骄傲，从这种蔑视中感到了解放。但是，与此同时，我们更感觉到了精神无所皈依之后的空虚以及欲望膨胀的可怕。

“田园将芜，胡不归。”陶渊明的呼唤是具有现实性的。在某种程度上说，古建遗址就是华夏民族的家园，对这样的地方进行维护和再建是应该有所顾忌，有所畏惧的。不然，我们这个民族还能到哪里去寻找神圣，得到皈依精神的家园呢？

祁嘉华
2012年2月

目 录

上 篇

第一章 重建唐城的选择.....	3
第一节 社会背景.....	3
一、世纪之交的机会.....	3
二、转型期的社会文化.....	6
三、古都的选择.....	8
第二节 遗址工程的启动.....	9
一、大雁塔广场.....	10
二、唐芙蓉园.....	11
三、曲江遗址公园.....	12
四、唐西市.....	12
五、大明宫遗址公园.....	13
第三节 世界文化遗产.....	15
一、“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	15
二、名城遗址面对面.....	17
三、比较与思考.....	21
第二章 唐代建筑走笔.....	27
第一节 城市.....	27
一、历史的演变.....	27
二、唐代都城.....	28
三、风貌特征.....	32
第二节 宫殿.....	33
一、宫殿总览.....	33
二、唐代宫殿.....	35
三、风貌特征.....	38
第三节 园林.....	41
一、园林概览.....	41
二、唐代园林.....	42
三、风貌特征.....	47



第四节 集市.....	49
一、集市概说.....	49
二、西市的规划.....	50
三、西市的建筑.....	52
四、西域风情.....	53
第三章 唐代的文化属性.....	56
第一节 鸟瞰.....	56
一、时代背景.....	56
二、独有的文化气质.....	58
三、唐代诗性文化的基本特征.....	60
第二节 细品.....	68
一、唐诗.....	68
二、唐三彩.....	71
三、唐代建筑.....	74

中 篇

第四章 千年佛境难寻觅——雁塔广场工程.....	81
第一节 历史回眸.....	81
一、唐代的慈恩寺.....	81
二、佛教圣地.....	84
三、雁塔题名.....	85
第二节 边走边看.....	86
第一站 雁塔北广场.....	87
第二站 雁塔南广场.....	93
第三站 不夜城.....	96
尾声.....	99
第三节 “佛”文化的异化.....	100
一、从精神畅游到感官刺激.....	100
二、从宁静到喧哗.....	102
三、从非功利到营利.....	104
第五章 芙蓉清逸方有韵——芙蓉园遗址工程.....	107
第一节 历史品读.....	107
一、皇家园林.....	108
二、芙蓉佳景.....	110

三、逍遥之境.....	112
第二节 边走边看.....	114
第一站 正门.....	115
第二站 紫云楼.....	117
第三站 芳林苑.....	120
第四站 彩霞亭·仕女馆.....	122
尾声.....	125
第三节 “道”文化的异化.....	126
一、风水的盲区.....	127
二、“道”家精神的消解.....	128
三、降解了的尊贵.....	131
第六章 曲江灵秀须雅风——曲江遗址工程.....	135
第一节 文化品读.....	135
一、历史上的曲江.....	135
二、曲江美景.....	137
三、文化魅力.....	138
第二节 边走边看.....	141
第一站 重阳广场.....	142
第二站 汉武帝鸣.....	144
第三站 曲江亭.....	147
第四站 阅江楼.....	149
第五站 烟波岛.....	152
尾声.....	154
第三节 “雅”文化的异化.....	154
第七章 高堂大屋非古市——唐西市工程.....	162
第一节 文化品读.....	162
第二节 边走边看.....	169
第一站 “遣隋使号”.....	169
第二站 西市广场.....	171
第三站 中心建筑.....	172
第四站 西市博物馆.....	174
第五站 大鑫坊·财神庙.....	180
第六站 放生池.....	182
尾声.....	184
第三节 “市”文化的异化.....	185

第八章 宫宇不全难成气——大明宫遗址工程	191
第一节 文化品读	192
一、历史变迁.....	192
二、琼楼玉宇.....	194
三、气象天成.....	197
第二节 边走边看	198
第一站 丹凤门.....	199
第二站 古建遗址.....	202
第三站 缩微景观.....	206
第四站 太液池.....	207
尾声.....	210
第三节 “气”文化的异化	210
一、“气”从何来.....	211
二、“气”的消解.....	214
三、传承与异化.....	217

下 篇

第九章 症结探究	221
第一节 标准的缺失	221
第二节 文化实力的不足	223
第三节 文化难以承受之重	226
第十章 回归之路	229
第一节 从态度说起	229
第二节 传统营造的分量	232
第三节 历史建筑工程呼唤文化质检	236
参考文献	240
后 记	244

上 篇

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还包括我们的城市面貌和社会心理。以鸟巢、水立方、央视新大楼为代表的北京奥运建筑，以中国馆为代表的上海世博建筑，还有以长安塔为代表的西安世园会建筑，无一不折射出转型时期人们的审美心理和价值追求。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文化产业的浪潮也由弱到强，呈风起云涌之势。古城西安也顺时而动，开始制定并逐步实施着“皇城复兴计划”。

与国内其他的历史名城不同，西安的有名不仅仅是古老，还在于这里曾经出现过中国农业社会的巅峰时代，创造了许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辉煌文明。这样的经历让西安人骄傲——哪怕已经过去了千年之遥；这样的经历也让西安人不安——帝都子民的经历与现实反差难以让人心安理得。于是，跨世纪前后中国社会的一次次变革，也在这座城市里产生着反响，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建设大潮。与北京的高速扩张、上海的国际化不同，西安的城市化建设更加看重自己的历史，试图在唐代遗址上创造出一个同样令人瞩目的天地。西安不缺历史，再造唐城的口号绝不是空穴来风；西安不缺实力，大批的仿唐建筑同样创出了深圳速度。但是，再造出来的遗址广场和公园到底保持了多少历史的真实？一个个冠以唐文化的遗址工程项目到底体现了多少唐代文化精神？只有当事人的回答显然是不行的。



城市品评

——以西安为例看异化的城市记忆



第一章 重建唐城的选择

当 21 世纪的曙光在古老的钟楼金顶上熠熠生辉时，古城西安也掀开了自己崭新的一页。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入世后的机遇与挑战，经济增长引发的躁动……在这样一个洋溢着激情和亢奋的时期，西安选择了一种更为怀旧的方式来寻求突破——利用城内众多的唐代遗址进行开发性建设，将古建遗址与旅游市场相结合，在改变当地空间环境的同时，也将尘封的历史变成了一种资源。让历史与现实对接，让古迹为今人造富。这样一个看似悖论的命题，在西安却找到了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逻辑。从最初的大雁塔北广场，到几年后的大明宫遗址公园，先后有五处唐遗址旧貌换新颜，在给 21 世纪的西安披上“唐装”的同时，也拉动着当地的经济——引来了众多游客的消费，还派生出了一系列为旅游服务的行业。当然，最大的获利点还不在这里，而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遗址周边的地产项目。在以经济论英雄的社会阶段，西安的做法确实立竿见影，但是却仍然延续着粗放型经济时期由地产拉动经济的路子。对这种发展思路不同专业会作出不同的评价，我们的关注点则主要集中在了文化层面，关注这种发展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古建遗址上搞经济开发，是将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变成了资本，存在着改变古建遗址性质的风险是肯定的。具体情况如何是后面的内容，这里先对产生这种做法的背景情况略加追溯。

第一节 社会背景

历史是足以让西安人骄傲的。然而，市场经济的务实性也让西安人不安。地处西部的地位，欠发达的现状，到底不如经济腾飞、人口膨胀、高楼林立来得光鲜，来得实在。尤其是看着其他省份一个个经济特区在短短的时间里迅速崛起，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城市”财大而气粗的时候，隐隐的失落让人难以名状，也引发着人们寻找突破口的冲动。

一、世纪之交的机会

心理学有一条“期望定律”：当人们对某件事情非常向往的时候，便会转化出一种强大的动力，促使人们努力去寻找机会，付诸行动。于是，所期望的事物更可能成为现实。这是 1966 年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得出的结论。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就是在期待中拉开序幕的。在国人的记忆中，不管是近代经受的內忧外患，还是 20 世纪 50 ~ 70 年代一次次席卷全国的“运动”，导致的最终结果都是贫穷。当人们领悟到贫穷就要受罪，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后，对“民族复兴”的期待就成为了压倒一切的梦想和目标。在经历了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得到实惠以后的国人更加期待着下一个世纪的精彩，将一个

个更有气势的蓝图转化为现实。

1. 西部大开发的机遇

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思想是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中国的西部范围辽阔,地域广大,总面积占到全国的71.4%,具体包括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内蒙古、广西在内的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西部地区资源丰富,疆域辽阔,少数民族众多,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但由于自然、历史、地域等原因,西部的经济一直落后,与东部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西部的发展情况如何,对整个国民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意义十分重大。

首先,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没有西部地区是不行的。西部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历史上炎黄二帝活动的主要地区就在西部,代表华夏文化精髓的不少遗迹也存留在西部。尤其是西安,更是由于历史底蕴厚重而被誉为东方的“罗马”。所以,中华文明的复兴不能没有西部地区,正如西方文明不能缺失“罗马”一样。

其次,要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没有西部地区是不行的。要想真正实现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必须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开始依赖国际市场,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培育国内市场的重要性被提到了日程。而要想提高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首要环节是让西部摆脱贫困,增大市场需求。另外,西部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水利、风能、太阳能、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资源存储量十分丰厚,能够为全国的经济发展提供能源保证。同时,相对于东部沿海城市的人口密集、土地紧张状况,地广人稀的西部可以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平台,能够实现地区开发和社会就业保障的“双赢”。所以,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讲,中国需要西部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1]

最后,要保证中国的社会安定与团结,没有西部地区是不行的。中国的民族人口分布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2],而西部地区就是少数民族的重要聚居地。中国共有56个民族,除汉族外,其中44个民族都分布在西部,因此西部大开发对维护民族团结有着重要意义。而且西部地区与俄罗斯、印度、越南、缅甸等14个国家接壤,占全国领土边境线的91%,更加凸显了非凡的战略意义。因此,构建和谐与稳定的社会环境,需要西部的支撑。

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就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3]21世纪初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可以说是对“两个大局”思想的进一步实践。

2.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势头。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始终得不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成为经济接轨国际的一个巨大阻碍,也

[1] 曾培炎.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2] 田雪原.中国民族人口[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5。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 1986 年开始,中国就踏上了漫长的谈判旅程,时任国家总理的朱镕基,就形容谈判时间之长足以让“黑发人变成了白发人”。2001 年 11 月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次部长级会议终于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法律文件——标志着中国最终叩开了世贸组织的大门。

世界贸易组织(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被称为“经济联合国”,^[1]负责监督成员经济体之间各种贸易协议得到执行的一个国际组织,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前身是 1948 年国际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的秘书处。世贸组织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法律基础和组织基础,在当代国际贸易市场中充当着管理者、监督者和纠纷裁判者的角色。截至 2011 年 12 月 20 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达到了 157 个成员,涵盖了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一,强化了危机意识,加大了改革力度。入世后的前 5 年,中国逐步兑现承诺,逐步“倒逼”自身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竞争的压力促使中国企业加快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加速了改制、重组、联合、兼并的进程。2005 年,中国关税的总水平从刚入世的 15.3% 下降到 9.9%,完全履行了作为世贸成员国的义务。其二,健全法制建设,优化市场环境。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对法律法规的立、改、废工作几乎从未间断,如废止了《汽车产业发展政策》,修改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中国主要的知识产权立法,比如《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及实施细则,都已进行了修改,同时提高全民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这样做使一些依靠仿制生存的企业难以为继,同时也为真正掌握核心科技,具有创新力的企业带来发展契机,赢得了市场。其三,最惠国待遇,实现中国和世界的“双赢”。入世十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货物出口占全球贸易比重的 10%,居世界第一。在 2008 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为世界经济的迅速恢复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3. 国际会议的举行

在现代社会,举办国际性会议(如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博览会、世界园艺博览会等),对一座城市而言无异于一次最高级别的检验,同时也会为这座城市带来各种荣誉和机遇。历数世界上一些知名城市,无一不得益于国际会议的成功举办。例如美国的圣路易斯(1904 年)、洛杉矶(1932 年、1984 年)、亚特兰大(1996 年)三座城市的迅速发展,都得益于成功举办的奥运会;还有日本的东京(1964 年),韩国的首尔(1988 年)都是借助举办奥运会作为现代经济迅猛发展的契机。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美国的纽约则是因为多次举办世博会而屡屡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历史上,世界园艺博览会的举办地大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和美国,亚洲国家只有日本先后在大阪(1970 年、1990 年)、冲绳(1975 年)、筑波(1985 年)举办过 4 届,韩国在大田(1993 年)举办过 1 届。因此,申办国际盛会的竞争,实际上是一场涉及国家综合国力、经济潜力、科技实力、文化魅力的竞争,也被看作是国家形象和民族地位的竞争。

[1] 李双元. 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兼论中国“入世”后的应对措施[M]. 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3.

世纪之交,举办国际性盛会的桂冠终于花落中国。昆明(1999年)、沈阳(2006年)、西安(2011年)相继举办了世界园艺博览会,为我国的经济、文化、旅游和城市环境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了第29届奥运会,成为中国在提升国际地位方面所矗立起的又一座里程碑,被视为中华民族复兴历程中又一盛事。同时,奥运会的举办也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城市管理、交通改善和国民素质的提升都发挥了积极作用。2010年,上海因为成功举办了世博会而再次吸引了全球的关注。世博会素有世界经济、科技、文化的“奥林匹克”盛会之美誉。上海市成功举办世博会,起到了消费促发展、发展促改革、改革促创新、创新促交流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国际盛会相继聚首中国,为中国的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荣誉,也引导中国走向了一个更加充满活力和包容开放的时期。

根据国际惯例,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首先看的是GDP指标;评价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看的是人均GDP。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国家GDP也出现了历史性的突破。2002年,中国GDP首次突破10万亿元,达102398亿元;2003年,中国GDP为117390.2亿元,比上年增长9.5%。此后,中国每年的GDP增长速度都保持在8%左右,这一水平远远高于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速,也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增速,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在世界经济普遍低迷的时期,中国表现出了强有力的增长势头。

按国际经验,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2000美元,再从2000美元到3000美元,一般需要10~15年时间,如德国实现前一个阶段用了9年,后一个阶段用了6年;日本则分别用了7年和4年。2003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到2006年就已经越过2000美元关口,2008年人均GDP上升至3000美元——也就意味着,中国的人均GDP从1000美元升至3000美元只用了短短5年的时间^[1]。社会学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的时候,其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将加速,随着产业结构、消费类型、生活方式等一系列变化,社会公众的心理需求也将发生重大转变。

二、转型期的社会文化

转型,这是一个看似简单的词语,但却蕴涵着丰富的含义。从词义上看,转型的主体处于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状态——原有的成分逐渐淡化,却没有完全消失;新生的成分逐渐增多,但也没有完全普及。就在二者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各种元素都会崭露头角,也就决定了转型时期社会文化的复杂与多元。所不同的是,中国社会的转型,不仅具有一般性,而且还具备了一些特殊性。

研究社会文化,角度不同得出的结果也不同。从理论入手,分析人们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动态,得出的成果尽管精到,却抽象而艰涩,终归属于“阳春白雪”,难免被“束之高阁”。从现实生活入手,分析人们在衣食住行中的变化与发展,可以得出更加具有现实针对性的结果,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起指导作用。尤其是建筑,技术的密集以及产业多元的特点,更能多角度地反映一定时期社会的物质和精神变化情况,折射出

[1] Barry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7.